

DOI: 10.13288/j.11-2166/r.2016.09.021

论《兰室秘藏》消渴七方

安宏¹, 陈子杰¹, 高思华^{2*}

(1.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,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1 号, 100029; 2. 北京中医药大学糖尿病研究中心)

摘要 试从《兰室秘藏·消渴门》中“消渴论”一文入手, 指出李东垣对消渴病的认识上溯《黄帝内经》, 近承刘河间和张洁古, 而消渴七方的主要制方思想即体现了这一学术渊源。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方药分析消渴七方的配伍、炮制和剂量特点, 揭示其制方规律及相互关系。

关键词 消渴病; 消渴七方; 兰室秘藏; 李东垣

《兰室秘藏》依病分为二十一门, 每门下先论后方, 内容涉及内、外、妇、儿诸科, 载方多为李东垣自创方剂, 可谓是李东垣学说之集大成者^[1]。消渴七方是指《兰室秘藏·消渴门》中所载的和血益气汤、当归润燥汤、生津甘露汤、辛润缓肌汤、甘草石膏汤、甘露膏和生津甘露饮子七首方剂。七方的主治相似, 除生津甘露饮子外, 皆以口舌干燥、能食而瘦和便结溲数等症为主, 热盛津伤的特点明显。各方主治稍有区别之处, 如当归润燥汤主“兼喜温饮”, 亦非主要矛盾, 故七方用药多涉石膏、黄连、黄芩等甘寒、苦寒之品, 这与李东垣以甘温补土为主的一般看法有所不同。同时七方多用当归、桃仁、红花等甘、苦、温之品, 并以升麻、柴胡诸风药贯穿其中, 又异于寻常治消方剂的配伍。消渴七方的特殊性, 导致了李东垣之后其虽屡见《卫生宝鉴》《赤水玄珠》等书, 但抄录者多, 而对其系统解读者少, 因此, 长期以来, 消渴七方作为一个整体并未得到医家的充分认识。

1 消渴七方制方思想探源

《兰室秘藏·消渴门》集中体现了李东垣对消渴病的认识, 对消渴七方的制方思想有重要提示作用。李东垣在篇首引《素问·阴阳别论》“二阳结谓之消”^[2], 认为“结者, 津液不足, 结而不润, 皆燥热为病也”^[2], 主张消渴的病机主要在阳明燥热, 手阳明大肠主津, 足阳明胃主血, 若数食甘

美, 阳明热盛, 耗伤津血, 则热淫燥盛而病消渴。李东垣治消渴, 遵《黄帝内经》倡用兰香等辛味之品, 而禁服膏粱、芳草、石药, 一则阐明消渴病的饮食宜忌, 二则纠魏晋以来用铅丹、石脂等慄悍燥烈治消之弊。

对该病分类和传变的认识, 李东垣从“三消”说。消渴分“三消”论治肇于北宋, 如《太平圣惠方》曰“夫三消者。一名消渴, 二名消中, 三名消肾”^[3]。刘河间据《黄帝内经》认为, 以“三消”分证, 所涉虽广, 然“其燥热一也, 但有微甚耳”, 一反前人以消渴为“上实热而下虚冷”的固见, 倡导统一从燥热论治“三消”^[4]。李东垣承刘河间, 以“舌上赤裂, 大渴引饮”为膈消, “善食而瘦, 自汗, 大便硬, 小便数”为中消, “烦躁引饮, 耳轮焦干, 小便如膏”为肾消^[5]。同时李东垣重视既病防变, 将治疗重点放在上消和中消, 所谓“上中既平, 不复传下消矣”^[6]。若误治失治则未传疮疽、中满。李东垣制消渴七方, 又深受其师张洁古“用药法象”和“脏腑标本虚实寒热用药法”的影响。张洁古发挥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气味厚薄理论, 将药物依四时五运之气分为“风升生、热浮长、湿化成、燥降收和寒沉藏”五类, 意在置人体于天地之间, 以药物模拟四时五运之序调和人体^[7]。同时张洁古又据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以药物气味内应脏腑, 并进一步以脏腑为纲, 以标本、虚实、寒热为目, 立用药规矩。这种天人相应观指导下的气味补泻理论, “外应运气, 内合脏腑”, 李东垣用药制方从中获益良多。

基金项目: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科学研究与研究生培养共建项目; 科学研究与研究生教育—科学研究与科研基地建设项目

* 通讯作者: gaosihua1216@126.com, (010) 64286556

2 消渴七方的配伍特点

消渴七方用药少者 13 味, 多者可达 24 味。用药虽多, 但所涉药味较集中。总结七方用药可以发现, 升麻、石膏、知母、甘草四药为七方共有。其中升麻味辛, 气味俱薄, 属“风升生”类, 解阳明之标热, 后世称其能发散郁火, 其实与解散标热无异; 石膏性寒, 味辛甘, 属“寒沉藏”类, 清解阳明标本大热, 与知母、甘草合用即白虎汤之意。同时方中苦寒诸药亦入中焦, 能泻脾胃火热, 如张洁古所云“脾胃: 味甘补, 苦泻; 气温热补, 寒凉泻”^[158]。诸药同用, 治重阳明, 切合李东垣以阳明燥热为消渴主要病机的观点。消渴既属燥热, 则在泻热的同时尚需兼顾润燥。七方中, 润燥之品可大致分为两类: 一类药多入血分, 如当归、桃仁、红花, 亦包括杏仁、麻子仁等。此类药性温, 味甘或苦, 多属“湿化成”类, 能和血润燥。张洁古治阳明津血亏而燥者, 示以桃仁、麻仁、杏仁、当归等药^[135], 与消渴七方用药基本吻合。七方中有用红花少许者, 目的亦在养血, 如《医学启源》曰“红花, 苦, 阴中之阳, 入心养血”^[214]。《本草衍义补遗》则进一步指出其“多用则破血, 少用则养血”^[1]。第二类药多属辛味发散之品, 如防风、荆芥、羌活等。此类药多属“风生升”, 其性主动, 能升清气、布津液, 若与养血润燥之品同用, 则“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”。《医学启源》所谓“燥淫于内, 治以苦温, 佐以甘辛, 以辛润之, 以苦下之”^[216], 正是对这一配伍的诠释。重视苦寒药的运用, 是消渴七方的第三个特点。消渴病的发生除阳明燥热外, 肾水涸与心火炽亦是关键。刘河间云“夫肾水属阴而本寒, 虚则为热; 心火属阳而本热, 虚则为寒。若肾水阴虚, 则心火阳实”^[275]。苦寒之品多属“寒沉藏”类, 除泻土以降心火外, 尚能入肾补水, 如《医学启源》曰“肾膀胱: 味苦补, 咸泻; 气寒补, 热泻”^[158]。可见消渴七方运用苦寒, 是泻心火而补肾水, 一药而两用, 颇合刘河间“肾虚心实”之言。

就单方而言, 李东垣主张以“君药分两最多, 臣药次之, 使药又次之, 不可令臣过于君”^[118]。若证无主次, 则各药等量, 如张元素所言“药之于证, 所主停者, 则各等分也”^[164]。和血益气汤中升麻、酒黄柏用量最多, 共为君药。升麻解散阳明标热, 酒黄柏泻火补水, 与臣药酒黄连共泻少阴本热。本方以清解标本之热为主, 稍兼润燥, 用药中正, 可视作消渴七方之正方。生津甘露汤中酒龙

胆、石膏、黄柏三药同属“寒沉藏”类, 用量最多, 共为君药, 以清泄里热为重。臣以酒黄芩、酒知母助君泻热, 又以等量黄芪、炙甘草、羌活、柴胡辛甘温剂, 防苦寒伤中。若由热转燥, 伤及阴液, 见阴头退缩、眼涩难开、目翳等阴伤之象, 则用当归润燥汤。是方以君药升麻解阳明标热之外, 臣石膏、知母、黄柏泻热补水, 又用荆芥穗、防风、麻子仁、当归身、桃仁等辛苦甘温以润燥。方用细辛、椒目二药, 并非只针对目涩、喜温饮等症而设, 考其用量极小, 置于大队泻火补水润燥剂中, 当在用阳化阴。辛润缓肌汤与甘草石膏汤二方组成相似, 唯黄柏、知母、石膏、黄连四药的炮制、剂量有别: 辛润缓肌汤治消渴证才愈, 其热较微, 故四药剂量较小, 且黄柏、黄连尚用酒制; 甘草石膏汤见咽喉肿痛, 渴喜冷饮, 口中如胶, 是热盛燥重, 故四药用量较大以泻火补水。及至甘露膏和生津甘露饮子, 则燥热尚存而虚寒渐生。然而“热气慄悍, 药气亦然, 二者相遇, 恐内伤脾”^[130], 故二方尽量选择平和之品调补阴阳, 避免燥烈助热。甘露膏重用石膏, 与酒知母、甘草、人参同用, 有白虎加人参汤之意。与前 5 方相比, 本方用药较精, 减黄柏、黄连等属“寒沉藏”者, 而酌用人参、兰香、白豆蔻、熟甘草、半夏等属“热浮长”“湿化成”者以补中和胃。生津甘露饮子用药最多, 主治又与前 6 方迥异, 是消渴七方中较难理解的, 如俞震言“古今治消渴诸方, 不过以寒折热。惟苦与甘略不同耳, 要皆径直, 无甚深义。独此方委蛇曲折, 耐人寻味”^[11]。方中以桔梗用量为最, 是一药而四用: 与石膏、知母、升麻诸药合用, 消舌咽肿痛; 同木香、姜黄等合用, 散心腹气结; 并毕澄茄、白豆蔻等治肠鸣幽幽而止泻利; 借人参、炙甘草、柴胡诸辛甘温药, 以升举清气。此外, 李东垣提出“气燥加白葵花”^[119], 与麦冬同用除肺中燥热。又少用全蝎, 借其走窜, 鼓动气血, 主前阴如冰、尻臀腰背寒诸症。全方用药, 风热湿燥寒五象俱全, 涉及五脏, 可见病症复杂。

3 消渴七方的剂量和炮制特点

与李东垣的其他方剂类似, 消渴七方的药量普遍较小。这种剂量特点虽与宋代以来兴起的煮散有关, 但与李东垣同时期的医家比较, 其用量仍然偏小, 值得深思。李东垣曰“心肺位近, 宜制小其服; 肾肝位远, 宜制大其服”^[21]。但“制小”和“制大”指药味还是药量, 则语焉不详。考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“近而奇偶, 制小其服也。远而

奇偶,制大其服也。大则数少,小则数多。多则九之,少则二之”^[307],似以药味多寡为大方、小方的分类依据。对此刘河间列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:曰“大方之说有二,一则病由兼证,而邪不专,不可以一二味治之,宜君一臣三佐九之类是也,二则治肾肝在下而远者,宜分两多而顿频服之是也。小方之说有二,一则病无兼证,邪气专一,可以君一臣二小方之治也,二则治心肺在上而迫者,宜分两微而频频少服之,亦为小方之治也”^{[12] 33}。可见直至金元,人们对大方和小方的认识仍不统一。针对上述两种相反的解读,刘河间认为,剂量大而药味少者为大方,因“肾肝位远,数多则气缓,不能速达于下,必大剂而数少,取其迅急,可以走下也”;剂量轻而药味众者为小方,以“心肺位近,数少则气急,不能发散于上,必小剂而数多,取其气宜散可以补上也”^{[12] 29}。刘河间的这段论述于李东垣的用药特点是极好的诠释。总结消渴七方用量,多者三钱,少者不过一、二分,其药量较小而药味较多,意图正在治疗上、中二消,同时保护脾胃及心肺之气,避免“制之太急,速过病所”。

消渴七方中,用药以酒制者有当归梢、知母、汉防己、生地黄、黄连、黄柏、黄芩、龙胆等,其中多数属“寒沉藏”类。《医学启源》曰“黄连、黄芩、知母、黄柏,治病在头面及手梢皮肤者,须酒炒之,借酒力上升也。咽之下,脐之上者,须酒洗之;在下者,生用……,当归酒浸,助发散之用也。”^[164]李东垣曰“以火酒二制为之使,引苦甘寒药至顶,而复入于肾肝之下”^{[12] 12}。可见酒制苦寒,在于借酒性升散,引苦降之品上升,将治疗重点放在上、中二焦。同时药用酒制,亦可缓其寒性,顾护脾胃,如《医学启源》所言“黄柏、知母等,寒药也,久弱之人,须合之者,酒浸曝干,恐寒伤胃气也”^[164]。

4 小结

李东垣认为,“脾胃一伤,五乱互作”,有“医之王道”之称,然而后世径称其为“补土派”未免以偏概全。事实上,不仅消渴七方,李东垣自制方剂中以苦寒泻土者并不在少数。称李东垣为脾胃大家,乃因其治病以脾胃为先,重视脾胃在五脏病传化转归中的作用,故不能将其脾胃学说简单地理解为补脾或补土。李东垣对消渴的认识,远承《黄帝内经》,近承刘河间、张洁古,所制消渴七方依气味补泻,外应运气,内合脏腑,如其所言:

“凡药之所用,皆以气味为主,补泻在味,随时换气”^[17-18]。首先,七方以辛凉与甘苦寒同用,泻阳明标本大热;辛甘与苦温同用,以疏风和血润燥;同时苦寒沉降,亦可益肾水而泻心火。这一配伍结构,突出了消渴以阳明燥热为主的病机,又标本兼顾、三焦同治。其次,七方虽以泻热润燥为核心,但仍有虚实寒热之偏颇。以和血益气汤为始,至生津甘露饮子为止,七方有由热转燥、由燥转虚、由虚转寒的趋向,展现了消渴病由燥热至虚寒的传变过程,正如李东垣所谓内伤病始则热中而未传寒中,是从整体论治消渴的具体体现。七方用药虽多,但分量极轻,君臣分明,炮制考究,着眼于上消和中消的治疗,体现了李东垣既病防传,保护脾胃的一贯主张。

需要注意的是,《兰室秘藏》距今较远,书中辨证用药与近现代多有不合之处,同时伪托李东垣之书众多,这为研究消渴七方的用药规律造成了诸多困难。限于水平,消渴七方中少数药物的用法尚无合理解释,如和血益气汤中麻黄根一药,李东垣多用其止身汗、阴汗,又入目疾齿痛方中,其用法似与消渴无关,而历代治消渴方也罕有用麻黄根者。对于这些疑惑,与其强解,不如存疑待考,俟同道指正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丁光迪.《兰室秘藏》是李东垣学说之集大成(一) [J]. 福建中医药,1981(1):7-8,12.
- [2] 黄帝内经素问 [M]. 何永,马君,何敬华,整理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6.
- [3] 李东垣. 兰室秘藏 [M]. 北京: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2011.
- [4] 王怀隐. 太平圣惠方 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82:1624.
- [5] 刘完素医学全书 [M]. 宋乃光,主编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6.
- [6] 郑齐,潘桂娟. 试析《兰室秘藏》消渴门七方 [J].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,2010,16(3):184-185.
- [7] 吴风全. 医学启源 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78.
- [8] 吴风全. 脏腑标本虚实寒热用方式校释 [M]. 北京:中医古籍出版社,2005.
- [9] 朱丹溪医学全书 [M]. 田思胜,主编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6:63.
- [10] 李东垣. 脾胃论 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5.
- [11] 俞震. 古今医案按 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7:61.
- [12] 刘完素. 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 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5.

(收稿日期:2015-10-16;修回日期:2015-11-20)

编辑:黄 健